

南京
李 弘 著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

(1368-1949年)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JIAGUO CHUBAN JIJIN Xiangmu

崔荣荣 牛犁 著

Cui Rongrong, Niu li Monograph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

(1368—1949年)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 1368-1949 年 / 崔荣荣, 牛犁著. —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629-4939-8

I. ①明… II. ①崔… ②牛… III. ①汉族—民族服饰—文化史—中国 IV. ①TS941.74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254 号

项目负责人: 杨 涛

责任编辑: 杨 涛

责任校对: 陈 平

书籍设计: 杨 涛

出版发行: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

邮 编: 430070

网 址: <http://www.wutp.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电话: 027-87515778 87515848 87785758 87165708 (传真)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

序 言

翔实的资料、广博的知识——为崔荣荣教授的大作写的小序

不久前，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有关中国部分的陈列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主持其事的教授来函垂询有关江苏省吴江一带妇女装束中头饰的佩戴方法，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由于我曾经被该馆聘为“文化资源共同研究员”，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提供准确的知识，以免其有关中国部分的陈列出现失误。近年来，因为研究唐装、“汉服”和汉服运动的相关问题，我曾经多次去江南一些地方的博物馆参观，也多少留意到江南妇女的头饰很有特点，可是要就其具体的佩戴方法做出准确无误的描述，就不能仅凭朦胧的印象了。于是，我这个不自信的“专家”就去请教真正的专家。很快我就收到了江南大学崔荣荣教授的回复，他不仅对江南水乡妇女的头饰给出了详细的文字介绍，还附上清晰的图片予以说明，并对包头巾（三角包头）、窄袖衫、作裙、大裆裤和绣花鞋等这一套传统的江南民间妇女的穿着，分别就其形制、名称、功能、质料、染色、刺绣、图案等给予了非常明晰的解释。只有具备扎实的田野调查经验和善于观察服饰细节的学者，才能够给出如此准确的地方性民俗知识，对此，我非常钦佩。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位民俗学者或人类学者而言，掌握准确、可靠、翔实和具体的地方性民俗知识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熟悉那些滔滔雄辩的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论。

崔荣荣教授这本名为《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的学术专著，正是这样以其具体到细节的准确性和基于翔实材料的实证性而显现出高度的专业水准。在我看来，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很多民俗学者，甚至是不从事服饰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所较为欠缺的。为了获得如此细致和精确的民俗知识，作者不仅搜证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献，更重要的是还做了大量的田野征集和调查。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本书对于很多似乎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也都做出了确凿无疑的专业性描述。例如，“瓜皮帽”是大家都熟悉的，但要把它陈述清楚，却不是那么容易。作者使用精准的笔触，不仅对瓜皮帽的产生、种类、款式变迁等作了详细的阐述，还对其与明清两朝的时代背景的关系作了必要的说明，揭示了这种服饰品与时代政治及民俗变迁之间的关系，这就一扫一般人士对瓜皮帽的某些刻板印象。再比如，旗袍，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极其富于中国特色，然而对于旗袍

的起源、各个时期旗袍造型的沿革等，学术界却莫衷一是，对此，本书也作了很多注重细节而又专业的阐述。从清朝时期汉满女性服饰文化的交流，到民国初年现代旗袍的登场，其发展演变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一目了然。在我看来，本书作者对于明朝以来汉族民间服饰之历史沿革的细节性描述的重视，恰好是对那些通常更多地只关注皇室和贵族的华丽服饰传统，并有意无意地将民间服饰简略化和粗线条化的服饰史研究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崔荣荣教授多年以来奔波于江苏、浙江等江南地区以及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的民俗实物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但凡参观过这个传习馆的人，都会为其汉族民间服饰之民俗文物收藏的丰富性所感染、感动，并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本书图文并茂，有许多珍贵资料正是源于该传习馆的收藏。以实物资料说话、以历史资料说话，本书包含着作者多年以来逐渐积累的丰富的民俗知识和服饰史学知识，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本书读起来分外引人入胜。

除了上文述及的贡献，若是从我近年集中研究“汉服”及汉服运动相关问题的角度来看，本书也有以下几点非常值得推荐，它们使我在很多方面都深受启发：

首先，21世纪初兴起的汉服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服饰史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传统服饰文化知识的普及，但是，人们对于“汉服”意义的建构，总是更多的关注于古代王朝的皇室、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服饰（诸如冕服、朝服、官服、公服和儒者的深衣等），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汉族民间服饰的意义，尤其是忽视了一般庶民百姓的日常服饰作为一种生活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性。鉴于本书是以汉族民间服饰为主题的，而且它的视野涵盖了明朝、清朝和民国初期，这几个时期几乎是汉族服饰文化史上最为剧烈变动以及对今天具有最直接影响的主要历史时段，因此，本书对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汉服”以及如何去理解汉族人民的服饰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具有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截至目前，中国服饰文化史几乎也主要就是帝王将相和儒者士大夫的服饰史，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史料不足或者认知的偏差等，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国服饰史的著述中，历朝历代普通民众的日常化、生活化服饰艺术都被豪华的上层阶级的精工化、等级化服饰艺术所遮蔽。

以皇家、贵族和古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华丽服饰传统固然重要，但若是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基本立场来看，一般民众的服饰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重要性也是自不待言的。换言之，只有把上层社会的华丽服饰传统和劳动阶层及市井庶民的质朴服饰传统相互结合起来，对它们均给予必要的重视和恰如其分的评价，那么，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服饰史才有可能成立。我觉得，当今中国社会若是多一些对民间服饰文化的重要性的关注，建构新的“民族服装”的文化实践，汲取服饰文化史资源，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本书在对明、清两代汉族民间服饰所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民国时期的汉族民间服饰有较大篇幅的讨论。从明朝至清朝，再从清朝到民国，汉族的服饰文化和汉族民间的服饰习俗均发生了诸多剧烈的变迁；特别是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一般国人的服饰生活与当今汉族人的服饰生活之间，存在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承继关联性。然而，现有的大多数服饰史研究著述对于民国时期的描述总是过于简约和粗糙。因此，本书所提供的诸多相关知识，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一般汉族民众的服饰生活艺术及其基本的格局，确实有着非常直接的建设性。例如，清朝的汉族服饰既有在强制同化政策下被迫中断和改变的情形，也有满汉服饰文化相互融合与交流的情形，尤其是从汉族民间服饰生活艺术的角度去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仅从朝服、官服等去归纳一个朝代的服饰文化，必然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再比如，民国时期汉族服饰文化出现的诸多新动向，在本书中都有所涉猎并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伴随着“易服”的时代潮流，在汉族民间的服饰文化中形成了西俗东渐的趋势，新的帽式、鞋履、内衣和各种配饰层出不穷，而所谓主服也出现了明显的西洋化倾向。然而，从清末继承而来的传统服饰文化的“存续”，由于中西服饰的“并置”而促成的“杂糅”与“混搭”，以及在国际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中式服装”等，所有这些对于近现代中国服饰文化史的基本事实及其复杂过程的描述，均应该成为我们深刻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民族服装”问题时的基础性起点。以汉服“同袍”分外执着的“交领、右衽”来说，其实在明朝时，汉族士人的袍服或长衫除了交领之外，圆领或盘领也同样颇为常见；此外，一部分“同袍”较为反感的

“对襟、立领”，其实对于明朝仕女而言也并不那么陌生。这些例子都说明现代人对古代“汉服”的理解，往往失之于简略和概念化，对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和服饰生活的复杂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第三，本书对于“服饰”的理解颇为全面，从首衣、足衣、帽式、鞋履，到主服、内衣，再到云肩、发式、首饰等进行了详细描述，还涉及化妆、妆容及各种民间饰物。作者对于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确实是有较为全面和体系性的把握，这就不同于汉服运动所试图建构的“汉服”，只是聚焦于礼服，甚至只是重视上衣、外衣的偏差。同时，这也和很多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往往只是将王朝“服制”视为唯一重要线索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本书很值得学术界同行认真学习的地方，读者从本书中可以体会到作者所秉持的很多富有价值的服饰文化思想。例如，本书作者认为汉族民间的服饰文化，无论是主服、内衣，还是与之配套的服饰品或配饰，既有不断的自然演化，也有缘于王朝更迭、社会与经济发展、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以及其他诸多复杂因素所导致的突变。对于影响汉族民间服饰文化演进和变迁的各种因素，本书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例如，本书关于“女红文化”和汉族民间服饰之间的关系所展开的讨论，分别是从小红商品化、才女文化的盛衰以及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解放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导致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等多种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的不同层面，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颇受启发。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尽管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曾经崇尚自长袍改良而来的长衫，但整个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却是短装化；今天，中国民众的服装已经彻底实现了短装化，但在21世纪初叶，新兴的汉服改革所追求或想象的“汉服”却又有回归袍服的趋向。对于此种悖论式的现象究竟该如何理解呢？虽然本书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能为我们进一步深刻反思相关问题提供必要帮助。

综上所述，我觉得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填补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的空缺之作，尤其是它基于可信的历史文献资料、实证性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民俗文物的实物资料，突出地强调了汉族民间服饰的地域多样性、流变复杂性等，所有这些

都使得它和已经出版的很多服饰文化著述相比而言格外不同。我非常愿意向各位热衷于思考“汉服”相关问题的朋友们推荐此书，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汉族服饰文化的传统性和汉族民间服饰生活的丰富性。即便本书或许仍有值得进一步开展学术商榷之处，但它所提供的翔实而又严谨的有关汉族民间服饰的史料，却是我们迈向新的服饰文化研究领域所值得信赖的基础知识。

认识崔荣荣教授，是在2008年于北京举办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上，当时，崔教授提交的有关汉族服饰文化的论文引起了我的兴趣。此后，我有幸参观了崔教授主持的江南大学汉族民间服饰传习馆，并在他的细心关照下，对无锡的汉服社团及其活动情况进行了访谈调查。多年来，我很荣幸有机会就汉族民间服饰和“汉服”、汉服运动等相关学术问题向崔教授请教，此次他的专著出版，我得以先睹原稿为快，为崔教授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写下这些读后的收获，权且为序。

周星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

2016年1月18日写于丰桥

目录

序言

001/046	第一章 明代汉族民间服饰的演变
047/096	第二章 清代汉族民间服饰的演变
097/146	第三章 民国时期汉族民间服饰的演变
147/180	第四章 汉族民间服饰与社会风尚变迁
181/204	第五章 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政治经济因素
205/226	第六章 汉族民间服饰与女性社会角色
227	结语
228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明代汉族民间服饰的演变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朝政权，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王朝。为了恢复汉族文化传统，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复兴华夏文化。如对元代蒙古族的各种生活习俗加以否定，摒弃原先元朝制定的以民族歧视为主要目的的衣冠服饰制度，重新易回华夏之服的传统，恢复汉族各种服饰形制及礼仪制度，在服饰形制中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结合古代中原服饰形制从多方面恢复和完善汉族王朝的衣冠服饰文化体系，《明史》中记载：“壬子，诏衣冠如唐制。”朱元璋主要针对宫廷及官宦阶层以法令的形式从服饰的面料、形制、尺寸、色彩等四个方面作了明文规定，初步形成了明代的服饰制度。另外，服饰制度从服饰各细节角度区分了社会各阶层的贵贱等级，不同阶层不能混穿，更不能僭越，民间士庶服饰的基本造型也来源于统治阶层规定的服饰形制以及官宦阶层燕居后自上而下的仿效。随着明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的纺织织造与手工装饰技术达到空前的工艺水平，使民间各阶层的服饰在款式造型、材料质量、工艺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形成了汉族民间服饰的独特风格。

第一节 明代汉族民间主服的演变

主服，即人们穿着服饰的主体部分。汉民族传统主服基本构成是“上衣下裳”的搭配，《说文解字》记述：“上曰衣，下曰裳。”明代汉族民间主服常见的有：直裰、曳撒、搭护、衫、程子衣、罩甲、袄、霞帔、褙子、比甲、裙、裤等服饰品类。

一、明代汉族民间男子主服的演变

明代汉族民间男子服饰式样繁多，服制中对宫廷和官宦等级都有详尽的服饰规制，但对士庶阶层的服饰规制则记载较少，从一些文献记载及图画上看，一般“士

人”阶层头戴四方平定巾，穿着圆领长袍或直裰等外衣；“农民”阶层在明代初期尤显简朴，短褐配裤。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种手工技艺繁荣兴盛，手工工场开始出现，民间燕居官员与富裕民众增多，奠定了服饰文化兴盛的物质与社会基础，服饰品类开始发生变化，风格也趋于奢靡多元。

（一）民间男子基本服饰形态

明初统治阶级对民间士庶的服饰形制和质料等作了基本规定，《明史》中记载：“庶人冠服。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绫罗、纁、纁、纁、纁……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这说明明初对于普通百姓的穿着打扮已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

实际社会生活中，民间男子按照“士、农、工、商”的“四民”分类不同，其服饰穿着搭配也是有较大差异的。“士人”阶层服饰更接近于上流社会的服饰形制，“农民”阶层的服饰形态显然是为了日常农耕劳作，“手艺人”阶层的服饰符号标志性格比较明显，“商人”阶层在古代地位较低，受到上流社会的忽略，服饰上不可僭越上流社会服饰形态，表现比较混杂。其他亦有如僧侣等多种服饰形态存在。

1. 士人服饰

明代士人，一般都穿着各类衫和袍服。

衫，也叫作衫子，是一种大袖单衣，以轻薄的纱罗为之，制为单层，不用衬里。它起源于汉代，魏晋时期士人喜其轻便，所着尤多，多见于江南地区。南北朝时，由于受胡服影响，穿此服者渐少。晚唐五代时期再次流行，宋亦以着衫为尚。衫的形制亦不断改变，出现了紫衫、凉衫、帽衫及绸衫等名目，“士庶百姓用作常服，文武官员用为便服”。

明代的衫为圆领宽袖，衣身两侧开衩，缀带系襟，领、袖、襟边有皂色缘饰。郎瑛在《七修类稿》卷八《国事类》中载曰：“太祖以学校为国储才，而士子巾服，无异胥吏，宜有以甄别之，令工部制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谓之襕衫。”

在衫的膝下部分拼一横幅即为襕，故这种衫又称襕衫。生员亦有在襕衫前后缀飞鱼补子，四周镶大宽边，前系二带，为明代士人居常服。《明史》也有记载士人穿着襕衫：“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缘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所服。洪武末，许戴遮阳帽，后遂私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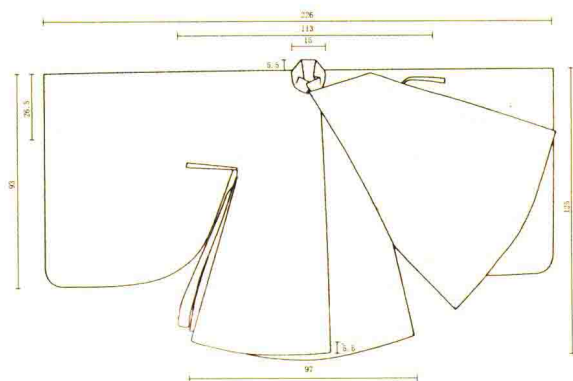
明代的衫后来形制发生变化，主要有交领和盘领之分，如图1-1为交领长衫（图1-2为其平面展开及各部位尺寸图），这种交领长衫多作内衣或家居服饰穿着，如图1-3便为《燕寝怡情图》中男子着交领长衫居家时的场景。同时，长衫还有连袖和无袖之别。如图1-4为无袖罗衫，该罗衫又称为搭护，《通雅》中记述：“搭护，秃袖衫。”搭护原为元代的衣名，本是一种短袖衣，与半臂较类似，明代王圻在《三才图会》中记述半臂为“今俗名搭护”。



图1-1 暗云纹白罗长衫（山东省博物馆馆藏）



图1-2 暗云纹白罗长衫平面展开及各部位尺寸图（山东省博物馆馆藏）



明代盘领衣，由唐宋以来的圆领袍衫发展而来，多作外衣或公服，也有连袖和无袖之别。《衣冠天下》中记载：“明代衮服原为交领式，自明英宗开始，衮服也改成盘领式，饰十二团龙和十二章纹样。”后民间士人争相效仿之，并逐渐流行于民间，只是去掉了繁琐的装饰。

袍，明代袍服多为圆领或交领右衽，缀有护领，宽衣大袖敞口，青色居多，衣身两侧开衩，缀带系襻，常以青罗缘饰。《明史》中记载，明代朝廷对袍的长短、颜色都有规定：“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洪熙中，帝问衣蓝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帝曰：‘著青衣较好。’乃易青圆领。”《閩世编》卷八中也对当时袍服的颜色、装饰、面料等作了记录：“道袍大概绸用单做，戎褐茧绸用夹里，后则俱以花纱白里为之，单绸若将不屑，不独士林为然矣。花云素缎，向来有之，宜于公服。其便服则惟有路绸、瓯绸、綾地、秋罗、松罗、杭綾、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惟有生纱、硬纱、生罗、杭罗而已。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若寒士则惟以白布袍为常服，加以乌巾朱履，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贵，缙绅接见，亦自起敬，列于峨冠博带之中，容相安也……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踵，后至极浅，不逾寸许。”

可见，在当时袍的面料随着季节、流行时尚、穿着场合、贫富差异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种类繁多。男子服装的衣长和袖长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由此可推断，袍服在明代一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男子服饰。

明代袍服代表性形式有直裰（又称直掇、直身、道袍）、曳撒等



图1-3 穿长衫的男子（选自《燕寝怡情图》）



图1-4 白罗交领无袖衫（山东省博物馆馆藏）

《通雅》中记述：“通曰长衣，或曰直身，故两京通称道袍，即汉之通裁也。”从结构角度看，这种上下通裁袍服具有衣身宽松、衣袖肥大的特点。民谣有：“绵绸直裰盖在脚面上。”“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这是因为此类宽袍大袖的服装适于表现文人隐逸旷达的风范，而作为平民服装则不能适应劳动的功能需要，故民谣把它看作“可怪”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图1-5、图1-6分别为明代著作插画和刻本作品中男性穿着直裰的场景。《金瓶梅》第六十一回西门庆“身穿青水缙罗直身”，这直身就是直裰，是明代男子服饰的基本款式之一，可作外衣穿着，也可在其他袍服里叠加穿着。

图1-7所示为素面赤罗袍，是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的明代士人袍服，圆领大宽袖，大襟右衽，赤色无纹样，系带连接，多幅顺次拼接，左右腋下各有一摆，袍服身长135厘米，腰宽65厘米，袖通长249厘米，袖宽72厘米。图1-8为其平面展开及各部位尺寸图，可以很好地验证其“宽衣博袖”的形态。

图1-9为山东省博物馆馆藏暗云朵纹青罗单衣，宽身交领右衽；图1-10为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素面绿罗袍，圆领宽身右衽，袖形特别，为弧形曲线造型。

明代男子还有一种常见的袍服形制叫曳撒，其形为上衣与下裳相连的束腰袍裙，是君臣外出乘马时所穿的袍式，休致后官员也常



图1-5 明代著作插画中男子服饰形象（选自《人镜阳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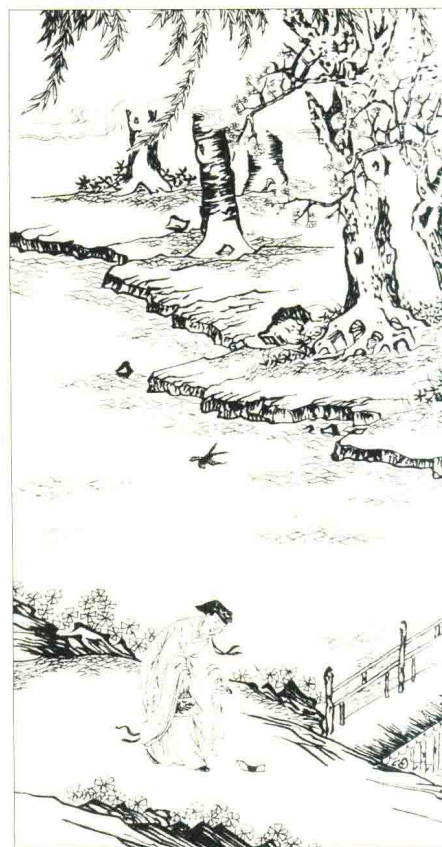


图1-6 明代刻本作品中男子服饰形象（选自《燕子笺》）



图1-7 素面赤罗袍（山东省博物馆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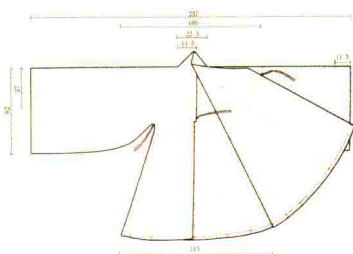


图1-8 素面赤罗袍平面展开及各部位尺寸图（山东省博物馆馆藏）